

技术哲学研究路径与转向之透视

卢 彪

(扬州大学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摘 要: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对技术的认识经历了由漠视到正视,最后进行哲学反思的艰难过程。技术哲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兴起的时间虽然短暂,但目前至少有两种路径转向值得关注,即:从技术目的论的研究转向对技术认识论的研究;从技术批判主义转向采用历史追溯和个案分析的方法。另外,技术哲学必须把自身当作一门哲学学科来建立,海德格尔的“座驾”说、齐曼的“糜母”说、莱文森的“思想的物质体现”说为我们理解技术哲学提供了“范式”。

关键词: 理性;技术本质;技术哲学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5)04 - 0082 - 04

纵观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技术的历史比科学的历史悠久。历史又表明人们对科学的反思却比对技术的反思更早、更深,哲学回避技术的原因无疑是值得研究的。保罗·莱文森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前,技术变革的速度很慢,技术存在虽然已经广泛渗透,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难以看见。而且被视为理所当然,所以就没有引起哲学家的注意。”^[1]由于哲学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以直观的技术诀窍为基础的与任何实践活动、技术活动相对立。因此,人们曾认为技术就是手艺,至多不过是科学发现的应用,是知识贫乏的活动,不值得哲学来研究。事实上,作为人类对改造自然总体性哲学反思的技术哲学,它的形成不仅取决于人类变革自然的能力和技术发展水平,而且也取决于哲学家们视角导向的转移。

一 艰难的历程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对技术的认识经历了由漠视到正视,最后进行哲学反思的发展过程。

《易经·系辞》所言:“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古代,作为形而上者的哲学研究常被看作是阳春白雪,而作为形而下者的技术实践则被看成是下里巴人。甚至有些思想家认为,技术发展与道德进步是背道而驰的。中国古代的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人多伎(技)术,奇物滋起”,这极大地强化了将哲学纯探索从实用技艺中剥离的哲

学目的。早在爱奥尼亚哲学家时代,技术也被排除在正统的哲学之外。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是把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与从事手工技艺的人彻底分开,并赋予哲学家以王者的地位;另外,哲学家探寻的惟一实在是理念或一般形式,而不是与制造相联系的物体。尽管亚里士多德从柏拉图的理想哲学中走了出来,强烈推崇经验观察,并对技艺从教化和制造两方面进行划分,但还是同他的老师一样认为:追求知识的理想才是绝对的光荣。事实上,在整个古希腊和希腊罗马,尽管希腊人在工程和军事技术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理论中贬低技术的偏向一直统治着他们的思想。

中世纪许多技术任务如酿造、造纸、制药等都是由基督教教会承担,而主要的建筑术则体现在神庙、教堂上。中世纪欧洲农耕技术的改进、新工具的发明、畜力的广泛使用,使农业产量大大提高。随着水磨的推广和机械钟的诞生,技术成了文明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人们对技术的态度也因此发生了改变,如圣·奥古斯丁认为:技术是神赋予的人的本性。此后,人们由对技术作用的肯定扩大到对技术有助于从事慈善的体力劳动的肯定。与古希腊相比,中世纪后期的行会赋予传播技艺的人以相当高的优越地位,基督教的传统也赋予手工劳动以与古代世界相当不同的意义。中世纪在各种技术特别是机械、动力、冶炼、建筑、航海等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是古代技术与近代技术之间不可缺少的中间

【收稿日期】 2004 - 12 - 29

【作者简介】 卢 彪(1963 -),男,江苏靖江人,扬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与科技伦理学。

环节,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

到了近代,随着德国的宗教改革、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以及地理大发现,特别是中国人的四大发明推动了欧洲技术上的进步。在诸多技术发明中,罗盘、枪炮、印刷术和钟表的出现具有特殊的意义。此时技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们对技术的哲学探讨有所加强。达·芬奇在考察了众多技术机械后指出:技术是把人类和自然界沟通起来的重要环节;F·培根把技术从科学中分离出来,并赋予技术以非常高的地位。他认为: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等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比起政治上的征服和哲学上的争论更有益于人类。同时,培根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法国百科全书》(1751 - 1772)是一部很好地反映了18世纪法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状况的巨著,而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狄德罗第一次给技术下了一个接近现代观点的定义。他认为:技术是为完成特定目标而协调动作的方法、手段和规则的体系。这是一个至今仍有重要影响的定义。

18至19世纪的产业革命使技术日益凸现的重要性,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哲学的眼光投向技术,密切关注生产与技术实践的活动的。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主张理性、实在论和进步,他在解释自然界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指出,人有资格成为自然的主人,这是由于人是世界上惟一能选择和确定目的的存在者,突出了技术的目的性,但他宣称人是自然的最后目的,陷入了神学的目的论。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运用唯心主义辩证法考察了技术过程,他把发明和利用工具看作是理性的技巧,是人利用自然界来反对自然界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他认为手段比外在目的更高,因为人是以工具而获得支配自然界的威力,而且工具会保存下来,工具的目的——直接的享受,则会消逝并忘却。

1877年,曾是左翼黑格尔派又有长期技术实践经验的德国学者卡普出版了《技术哲学概论》一书,侧重于从研究工具与机器这种技术手段入手,揭示技术的本性。他把所有的工具和机器看作是身体各种器官的外化,即“器官投影”。他主张技术是推动文化、道德、知识进步的手段,人类要通过技术得到自我拯救。卡普是第一个提出“技术哲学”概念的人,他开创了系统的技术哲学研究,被誉为技术哲学的创始人。

二 转向的路径

技术哲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兴起的时间较为短暂,缺乏公认的理论权威和经典著作,即使一些著名学者的思想也经常受到质疑。回顾技术哲学发展的短暂历史,对技术哲学的研究,目前至少有以下两种转向的路径。

第一种路径转向:从技术目的论的研究转向对技术认识论的研究

常规的观点认为,技术发轫之初,它是一种为了人的目的而支配自然的方式,比如追求食物和住所的生产(理性而积极的技术应用),后来它才误入歧途,成为人支配人的工具。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四因说”,狄德罗对技术本质的认识以及康德在解释自然界和人与自然关系时突出的技术,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技术理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技术哲

学的研究在总体上从崇尚理性的道路走上了反理性主义的道路,这与一战造成的巨大物质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与意识形态危机有关。雅斯贝尔斯认为:技术——生活秩序,一开始就保存了人的实在的世界,给人提供商品。然而,有一天,个人周围实在的环境再也不是为了他的目的而制造、塑造或制作了,他的住所是机器制造的,环境失去了活力。此时,可以说,人失去了他的世界,像无根的浮萍,缺乏一切历史连续性,没有过去与未来的感觉,他难以成其为人,这种技术——生活秩序在普天之下推广开来之后,人在这个世界里的生活,就沦为单纯的机械运行而已。马尔库塞批判了受到技术错乱的理性,他认为:“日益增长的对技术的驾驭能力”,起初能够把人从不动脑筋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去实现自己的潜力,然而后来在满足人的需求时,“它却只能是一个副产品:日益增长的文化财富和知识,(提供了)进行性破坏的材料。”^[21]在技术哲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德国学者德索尔竭力为技术作辩护。他认为科学和技术是人类得以在世界上生存的力量所在,并在为人类生存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途径。随着传统工业技术的无度发展(与人的认识有关),人类日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和发展极限。现在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给人类文明自身带来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从来没有如此的严峻和紧迫。随着哲学的主题性转换(存在论—知识论—生存论),技术哲学研究要以实践哲学或生存哲学为基础,以是否有益于人的生存与发展作为判断技术发展的主要标准,着重对技术发明、创新和扩散的认知过程、结果及其评估的探讨和技术应用后果的哲学反思。时代要求我们必须高度关注与生存和发展休戚相关的技术的认识问题以及价值、伦理问题。

第二种路径转向:从技术批判主义转向采用历史追溯和个案分析的方法

任何技术的发明和改进,都有“节省投入(包括体力),提高产出”的动机,即所谓“投机取巧”,中国古代的庄子通过对“抱瓮而汲”的老瓮的赞颂,来表达他对含有“机事”与“机心”一类技术的反对态度,比庄子反技术还彻底的是18世纪法国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卢梭,他连技艺、艺术在内的一切文明都加以反对,主张回到自然状态,过原始的生活。机器的出现是现代技术诞生的标志,也被视为是技术发展史上的断裂。现代技术设定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它所隐含的人和世界的关系与古典技术相比确实不同。“古希腊人的世界观和自然观念使他们不会对现代技术有兴趣;中世纪注重整体的古希腊本体论哲学和一神论形而上学,引发了基督教思想启蒙,但关闭了通向现代技术的道路。只有当旧的人和世界的观点崩溃后,现代机器技术才有可能”立足,甚至可以说,“信仰与技术的分裂是现代技术的起始”^[31]在这一新时代里,许多学者对技术持批判的态度。1918年,德国哲学家施本格勒出版了《西方的没落》一书,在该书以及他的《人和技术》等著作中,他认为机器破坏了人类文明的传统,其神秘而凶恶的威力使得工人到厂主、到技术创造者都变成了“机器的奴隶”,“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是人工的”^[41]。芒福德把机器生产视为“野蛮的新纪元”,芒福德认为,现代技术就是典型的

单一技术,它是不符合人性的权力主义技术。存在主义哲学流派的最杰出代表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发展是危险的,技术使人从存在中异化。总之,“技术社会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真正合乎人性的社会,因为它把物质事物而不是把人放在首位。”^[5]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中,技术起到了基本推动力的作用。美国学者麦克莱伦第三和多恩从历史的视角解读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得出:“历史表明,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以及在此后的任何一种文明中,技术都是塑造成和维持人类社会的决定性因素。毫无疑问,只要人类还存在,只要人类还住在地球这颗行星上,人类必定还将继续利用他们掌握的技术去改造世界。”^[6]知名理论物理学家和科学技术学家约翰·齐曼对技术创新的研究方法是值得关注的,他通过大量的个案进行分析,比如:日本刀、爱迪生电话概况的案例等,说明“技术创新的长期历史用实例证实了最宏观的进化现象:变化的新模式的涌现。”^[7]M·弗里斯探讨了技术知识的本性,他首先分析了不同类型的技术知识的获得,由此概括了历史的、哲学的和设计者——实践者的观点,进而将受限于航空学的工程技术的分析扩展至工程学的其它领域,特别一提的是,他将近来对菲利普研究实验室的研究作为经验材料的一个来源。

因此,只有把握技术的人文尺度与技术的自然尺度,在坚持善意的质疑和批判的基点上,加强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家与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家的对话与沟通,才能有效地发挥技术哲学推动技术健康发展。

三 路径的透视

技术哲学不管是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作为哲学的发展方向,必须把自身当作一门哲学学科来建立,才能使技术哲学研究深入下去。伊德认为,哲学能做的事情有两件:首先,“它可以为研究领域提供视角——在这里的领域就是技术现象,或更好地说,人类——技术关系的现象。其次,哲学可以为理解提供构架或‘范式’。”^[8]在这方面,海德格尔、齐曼、莱文森对技术本质的认识值得关注。

1. 海德格尔的技术本质——座驾

海德格尔从早期《存在与时间》中对工具的现象学分析到后期《技术的追问》等文章中得出技术的本质是“座驾”(Ge-stell)的结论。海德格尔用他的现象学方法为我们认识技术提供了新的向度。对技术的流行见解,海德格尔认为有两种。一种认为技术是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另一种认为技术是人类的活动。前者是工具性的定义,后者是人类学的定义。海德格尔认为这两种定义固然正确,但却不足以揭示技术的本质。要揭示其本质,必须进一步追问:工具本身是什么?在海德格尔看来,只要有目的的被追求和手段被使用的地方,只要在工具盛行的地方,就盛行着原因。因此,海德格尔就转到了对传统的“四因说”的讨论上,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就是使某物呈现出来,这样尽责就与“产生”联系在一起,产生就是从遮蔽到解蔽的过程,所有产生制造活动的可能性都在于展现。“因此,技术不仅仅是技术的手段。技术是一种展现方式。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点,那么技术的本

质的另一个完整的领域就会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展现,即真理的领域。”^[9]那什么是现代技术的新东西呢?是“挑战”。在海德格尔看来,支配现代技术的展现是一种挑战,它施于自然过分的要求。因此,所谓挑战是迫使事物进入非自然的状态的展现。在遭受挑战的过程中,挑战性的展现无疑需要人来完成,但人却不能支配这一展现本身。相反,只有人去遭受挑战,去挑战自然,这种展现才能发生。海德格尔把这种挑战性的要求称之为“座驾”。作为座驾,这种挑战性要求将人与自然纳入一个刻板的结构中。人定位于这一机构,就是要通过技术挑战自然,将自然展现成持存物。自然定位于此机构,就是要通过技术,将自己以持存物的方式展现出来。因此,海德格尔认为,正是这种作为施之于人的挑战性要求的座驾充分表明了技术的本质。

2. 齐曼的技术本质——糜母

技术变化是我们现代文明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齐曼认为,“技术”概念并不局限于物质客体,它还包括各种各样的系统性技术程序,如耕作规程或医学疗法,对这样的技术而言,物质器械并非关注的中心。齐曼认为:“为了维持全面的类似,我们常常方便地采用‘糜母’(memes)这一术语来讨论技术系统,那是一个历时持久、自我复制并塑造实际人工制品的基本概念。”^[10]糜母这一术语是抽象的、隐喻的。在操作上,“糜母”并不等同于由孟德尔假设并由克里克和沃森加以丰富的不可分实体。“糜母”与“基因”押韵(即使不完全押韵,也可唤起人们的想象)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必须像两粒豌豆那样相像。在强调技术性状的可遗传方面,“糜母”语言颇具有指导性,这与展现这些性状的人工制品的物理生存截然不同。在新的人工制品的任何工程运作开始之前,人们常常需要它的设计进行多次分析与修正。适用于实际人工制品的技术糜母可以被独立地进行传递、存储、恢复、变异和选择。例如,完全可以单独根据一张旧照片或专利说明,装配一辆可以使用的前轮大后轮小的新式自行车。人们在讨论思想时,不可避免地要谈及思维实体,如思想、概念、观念、信念、设计、理论等。所有这些,都具有能够差不多不变地在大脑之间持久存留并被传递的特性。它们也能够“进化”,沿着一定的路径通过“变异”和“选择”而变化。毫无疑问,这些特性在所有形式的文化变迁中都扮演着一个主要部分。因此,齐曼认为:“关于技术创新的进化推理需要一个适合所有这些实体的宽泛的普遍术语,以表明它们果真拥有这些能力。”^[11]当然,选择论不要求“糜母”也必须是微粒子的、多产的、可忠实复制、长命的、可二进制编码的,等。“因此,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现在觉得可以非常自由地使用这一术语,只要它有助于我们的讨论。”确实,我们已经发现,在技术变化中,“糜母”是主要的角色——也许是最重要的角色。”^[12]

3. 莱文森的技术本质——思想的物质体现

1986年保罗·莱文森发表了她的又一部力作《思想无羁》,这本书既描绘了网上世界,也描绘了人与技术的关系,它从哲学和历史的视角叙述知识进化。正如他在这本书中所言:“在本书里,我们自始至终将会看到,每一种技术都是

思想的物质体现,因此一切技术都是人的理念的外化。在外化中并通过外化,我们可以读到技术所体现的思想。^{〔13〕}他认为:“技术是为了自我创造而运行的。”^{〔14〕}在他看来,技术可分为二等:第一等的技术即人的一般技术,是在改造外在的物质世界;第二等的技术即认知的技术,是在改造我们内在的心灵世界——心灵世界是一切技术的源泉。莱文森认为,认知技术和一般技术也许是同步进化的,但是,属意认知的技术显然是两个伙伴中比较年轻的伙伴,这个关系直到近代才有所改变。认知技术姿态低、数量少,一个历史原因可能是:我们的感官和心智在没有依傍和凭借的情况下,生产知识的效能,比徒手空脚操纵物质世界的能力强大。因此,锄头、船舶和武器之类的实用技术比认知技术进步的速度快,因为我们裸体的人类祖先更加迫切需要的是劳动工具,而不是推理工具。以认知为宗旨的技术战胜以自然方式获得知识的技术,原因之一是,现代技术搜集和加工信息,不是以取代自然能力的方式,而是以复制和延伸自然能力的方式,使人能够达到自然能力过去不能运作的领域,比如星系。莱文森以现实的三种客体或现实相面:一棵树、如何将这棵树用于传播的一个念头、一张纸为例来说明技术的本质。在这三种实体中,前两种实体可以用物质/思想二分法进行分类:那棵树是物质客体,那个念头是头脑或思想的产物。在念头可能存在的宇宙语境中,那棵树是所谓未思想化的物质。同样,关于树的用途的分类的念头,可以这样来界定:在物质存在是可能的宇宙语境下,一个念头不仅仅是一个念头,它还是一个非物质的思想或未经体现的念头。物质和思想经过精细的协调,构成未思想化的物质和非物质的念头,给那张纸作了精确的定位:它既非纯粹的物质,亦非纯粹的思想,而是两者的结合,是如何用那棵要来传播的念头的物质化(在这里,就是把树切成很细的薄片用来写字)。所以,纸张是思想化的物质或物质化的思想。“因此,精神和物质在技术中的混合,既反对简单的唯物主义,也反对简单的唯心主义,但是它戏剧性地证明了二元论的主张。”^{〔15〕}莱文森之所以认为技术是思想的物质体现,还在于“技术是成功知

识的表现”^{〔16〕}。事实上,技术赋予给我们的能力,会随着技术的失去而失去。但是,这肯定不能成为不利用这个技术的理由。技术的价值,正是由于它们能够赋予我们本来不具备的能力。“思想就在技术中固化,与其说是把非物质转换为物质,不如说是把物质属性从不太稳定(虽然有生成能力)的物质基地(大脑)转化为相对稳定(虽然无生成能力)的物质集装箱:技术。”^{〔17〕}

技术哲学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目前,对技术的研究在各个方面开展了起来,技术在人的整个生存中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各种技术哲学观纷纷形成,我国近几年在技术哲学方面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正是出于关注人类本性和人类实践的一贯传统,哲学才有可能在关于技术的研究和讨论中发挥作用;但它只有在深刻知晓过去的哲学实践中探讨这个问题的全部内容时,才有可能把这场讨论引向深入。

【参 考 文 献】

- [1][2][13][14][15][16][17]保罗·莱文森.思想无羁[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83、297、209、119、83、118、289.
- [3]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138.
- [4]达夫里扬.技术·文化·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34.
- [5]陈昌曙.技术哲学引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42.
- [6]詹姆斯·E·麦克莱伦第三,哈罗德·多恩.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438.
- [7][10][11][12]约翰·齐曼.技术创新进化论[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343、6、341、341.
- [8]Don Inde. Technology and Lifeworld[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9.
- [9]高亮华.论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4):19-25.

(责任编辑 魏屹东)